

媒體改革的回顧與展望

盧世祥

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執行長

- 一、台灣媒體成為社會亂源的原因：唯利是圖、唯我獨尊、少數統治
- 二、媒體改革不成：我就是不要臉，你能拿我怎麼樣！
- 三、黨國體制的必然：報禁重於黨禁、掌控 NCC、箝制新聞自由
- 四、「黨政軍退出媒體」是民進黨天真無邪媒體政策的代表作
- 五、新黨國之下令人關切的言論限縮：瘋狗、哈巴狗、看門狗
- 六、中資一定介入
- 七、傳統平面媒體的生存空間：專業、企業、利基

公元二〇〇二年十月一日，時任行政院衛生署代署長的涂醒哲，被立法委員李慶安誣指酒後對一男性舔耳朵，事涉性騷擾，次日經《聯合報》等新聞媒體渲染，「涂醒哲酒酣耳熱舌襲男人」、「首長形象被『不太衛生者』破壞」、「此公毛手毛腳『聞名』衛生界」，社會譁然。此事經司法機關迅速偵辦，旋即真相大白。

如今看來，「舔耳案」其實預示政媒聯手擾亂台灣，即將變本加厲。在此之前，經由政媒聯手，以作偽弄虛消息攻訐他人的行徑亦曾出現；所謂「台北市長陳水扁到澳門買春十六次」、「陳幸妤未婚懷孕」、「陳致中當少爺兵」等謠言都曾喧騰一時。不過，在「舔耳案」之前的政治爆料，政客作秀與媒體炒作新聞的性質較大於政治鬥爭，政媒聯手一般尚屬「未謀而合」，各取所需。「舔耳案」之後，假借揭發之名，行政治鬥爭之實的各種惡劣手段盡出，其間政客與政黨固然無所不用其極，若干媒體介入政治鬥爭，非但悖離專業倫理，配合演出，猶常主動以不實資訊誤導公眾，甚至政媒合謀，趙意妄為，試圖左右政治走向，遂使政媒亂台的戲愈演愈醜陋。

這樣的變化，二〇〇〇年歷來首度政黨輪替是轉捩點。在此之前，台灣媒體長期是威權體制之下的哈巴狗、黨國當局的幫凶與幫閑。李登輝總統促成民主，終結外來統治，已令一心維護少數統治的政媒勢力不滿，但當時只是透過「砲打黨中央」之類的主流與非主流政治鬥爭，外加出走的極端派製造裏應外合假象，政媒聯手亂台雖初現端倪，畢竟仍屬黨國之內部的茶壺風暴。進入新世紀之後，政黨輪替，朝野易位，本土政權一再獲得人民支持，上述政媒勢力抓狂益甚，聯手

政治鬥爭乃更為常見，手段也愈來愈惡形惡狀，選局舉期間尤成家常便飯。其結果是，惡鬥不已的國會與媒體，被公眾指為社會亂源。

去年的總統選舉，黨國體制者班師回朝，顯示政媒聯手已然奏效。吾人回顧台灣自一九八八年報禁解除以來，繼之以九〇年代的電子媒體解禁，如今台灣社會「第四權」最偉大，業界對專業倫理與自律棄之如敝屣，享有充分自由的新聞媒體竟淪落成社會亂源，媒體改革不進反退，究其原因，可以從媒體本身、執政者態度與政策、社會環境分別討論。

媒體經營者唯利是圖是媒體亂象的原因之一。從前東森集團總裁王令麟二〇〇四年「Show me the money!」談話，到最近壹傳媒黎智英被指為「核心事業是由由滿足閱聽人的窺視癖獲得利潤．．．最基層由無所不在的狗仔隊所落實」，都是此中之尤。有媒體老闆如此，為了追求利潤極大化，不論傷人名譽、窺人隱私，以屍體與裸體「兩體」對社會灑狗血，毒害下一代，都在所不惜。台灣媒體產業，特別是電子媒體的數量眾多與因此所形成的分眾化甚至細眾化，使得媒體經營只要掌握一定的收視率及營收來源，即可無視大眾普遍的觀感，惡形惡狀。市場機能就長期而言，雖然發揮若干功能，昔日威權時代「兩大報」的《聯合報》與《中國時報》，以其與台灣主流民意悖離，如今閱報率兩家相加不如《自由時報》一家，即其一例。不過，分眾化或細眾化以及退場機制的付諸闕如，卻使得市場機能不但失靈，導致劣幣驅逐良幣，還有不少媒體以種種惡劣手法苟延殘喘，整體產業不僅無以增進公眾福祉，還把台灣帶向沉淪之境地。

唯我獨尊是造成媒體亂象的另一原因。媒體解禁與自由化係台灣民主進程的具體成果，但是，台灣在歷經民進黨執政，新聞自由明列亞洲第一的同時，把新聞自由無限上綱，視同可以超越國家安全、公眾福祉，甚至法律之上的聖牛，顯然是一種迷思。在年輕民主台灣，「第四權最偉大」正是此一迷思的具體而微，也是媒體唯我獨尊文化的具體表現。事實上，所謂「第四權」是新聞界自我膨脹的名詞，凸顯的是台灣新聞界為嚴以責人、寬以律己的特權找藉口。從常識即可戳破這種謬論：所謂「第四權」，應係指政府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權之外的公共部門，惟政府三權，分立而相互制衡，且不謀私利；媒體如果是「第四權」，豈可營利？況且還無視社會公器特性而「唯利是圖」！媒體如果是「第四權」，誰來制衡媒體？必須強調的，台灣媒體的唯我獨尊不僅表現於新聞界整體的傲慢與自大，同樣顯現於媒體之間不能成熟處理同業關係，同業自律不行，最近為了在紐約圍堵陳幸妤醫師而電視新聞同業相互攻訐，連平面媒體也插一腳，即此一例。

媒體亂象更深層的癥結，是少數統治。按美國 CIA 的數字，外省族群在台灣人口居 14%，但《財訊月刊》二〇〇〇年調查台灣三大報主管結構，發現《聯合報》三十四位主管，外省族群佔二十八人，達八成；《中國時報》外省主管達

六成六；即使《自由時報》，外省主管也有兩成五。去年七月，國家通訊社中央社人事改組，董事長除外，行政院長任命的十一名董事至少七成與劉兆玄同屬外省族群。去年九月，台北市新聞記者公會改選理監事，理事長及常務理事人事同樣明顯反映新聞界的族群失衡或少數統治。媒體經營者及主管的族群結構左右其立場，按《財訊月刊》上述探索，外省族群的《聯合報》，「反獨反李不反共不反扁」；同屬性的《中國時報》，「反獨反李不反共不反扁」。相形之下，《自由時報》「反共反統親獨親李」。如今九年之後經過政治與新聞環境演變，外省族群的《聯合》《中時》「反獨」「反李」立場不變，「不反共」改成「向中國傾斜」，「不反扁」不但轉為「反扁」，且已幾近病態。《自由》變化很少，大概只有「親李」微調為「疏李」。

新聞界的族群失衡或少數統治，不但足以解釋台灣國家認同的錯亂，不少媒體近年對於兩位本土總統的「逢李必反」、「逢扁必打」，甚至禍延涂醒哲這樣的本土政治人物，有如前述「舔耳案」的新聞偏頗與亂象所顯示者。另一方面，把「自己人」馬英九一路包裝而為「媒體寵兒」，甚至不惜讓台灣加速成為中國的一部份。二〇〇五年，美國《洛杉磯時報》觀察台灣媒體的表現，有極其貼切的結語：他們無能處理真相(They can't handle the truth)，其角色從昔日威權時代的哈巴狗，變為民主時代的瘋狗。只是如今「自己人」已經班師回朝，有如各界所看到的，「瘋狗」現今只咬綠不咬藍，在愈來愈多事務透過新聞解釋權與議題設定權，甚至又重返「哈巴狗」角色。

台灣媒體的深層結構與生態如此，談媒體改革，當然不能以正常社會的正常方式為之。就此而言，「黨政軍退出媒體」原係針對當年舊黨國而發，民進黨執政之後大力推倡，卻毫無執行力，如此不自量力，如果不是出自蛋頭之屬的天真無邪，就是頭殼壞去。其必然的結果，當然是「你退我不退」，家大業大的黨國如何可能退出媒體？三中交易到今天猶黑幕重重，即此一例。民進黨的天真無邪或頭殼壞去，尚不止於此，李文忠接受 NCC 組織按立法院政黨比例提名委員，陳水扁「寧要新聞自由，可以犧牲國家安全」、「我任內不關閉電視台」等等，都足以凸顯這種媒體政策幼稚病的心態；其自敗民進黨事小，讓台灣有亡國之虞，代誌才大條。

相形之下，黨國體制者深知媒體攸關統治權之維護。蔣經國當年在內外交迫之下走向民主之路，其開放黨禁（一九八六年）先於報禁（一九八八年）；黨國體制當局即令在野，也要弄出違憲的 NCC 組織法以絕對掌控之，是兩個顯例。馬英九政府上任以來，把黨國黑手伸進媒體，箝制言論自由，引起國內外側目，從台灣的澄社，到自由之家、國際特赦組織、無疆界記者組織等國際人權機構，乃至於美國學界、國會，咸表關切。然而，黨國體制者以掌控媒體為要務，媒體

改革當然只有靠邊站，自己人之間只有共生，如何改革自己人？（2009 年 2 月 21 日）